

# 财政分权与支出偏向的动态演进

## ——基于非参数逐点估计的分析

□安苑王璿

(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本文使用非参数逐点估计方法分析了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平均而言,财政分权促进了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建设支出而忽视科教文卫支出的偏向;而通过将这一支出偏向效应拓展至动态发现,在财政分权度从低到高变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跳跃点,在此点以下,分权显著地促进了支出偏向,而当分权度达到此点以上时,分权的支出偏向效应则大大减弱。进一步分析随着时间演进分权对支出偏向的影响发现,高分权度地区的支出偏向趋于缓和,而低分权度地区的支出偏向却持续恶化。如果将财政支出模式变化作为增长模式转变的一种表现,这种分化意味着区域间长期增长潜力的差距趋于扩大。

关键词: 财政分权; 支出偏向; 非参数逐点估计

中图分类号: F810.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56(2010)07—0042—09

中国式财政分权所形成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机制被认为是过去三十余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之一,<sup>[1][2][3]</sup>而这种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标尺竞争所引发的政府支出偏向,特别是对社会性支出的负面影响也广为关注。<sup>[4]</sup>一方面,在分权条件下,为了吸引投资和发展经济,改善执政绩效,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经济建设的投入使中国最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sup>[5][6]</sup>;另一方面,财政性教育支出、科研支出占GDP的比重和政府预算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却逐年下降<sup>[7]</sup>。今天,再分析分权对于地方政府资源配置偏向的影响已经不再是新鲜的话题。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关于财政分权如何影响支出偏向的动态过程却并不清楚,也就是说,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分权影响的整体效果,或者进一步划分时间段和区域<sup>①</sup>来分析其影响的差异<sup>[8]</sup>,而在分权度从低到高的变化过程中,其对支出偏向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以及随着时间演进和财政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分权的支出偏向效应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仍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本文尝试通过非参数逐点估计方法将分权的支出偏向效应扩展至动态以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

### 一、文献回顾与基本思路

古典财政联邦主义认为,联邦制下的财政分权可以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其机制在于:一、根据哈耶克关于分散性社会知识的观点,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在了解本地居民的需求和偏好方面更

①目前文献中通常以分税制作为时间的分割点分段回归,或划分东中西三大区域分析分权影响的差异性,如傅勇、张晏<sup>[8]</sup>。

具有信息优势,与中央政府相比能提供更适合地方需要的公共产品的供给组合;二、人口的迁徙和流动性即“用脚投票”所形成的地区间的竞争将会制约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居民的需要选择相应的税收水平和公共产品组合。以上两种地方政府的竞争机制将会激励地方政府的行为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为取向。<sup>[9][10]</sup>

在中国,财政分权则讲述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分权的绩效更多地体现为其对经济增长,而不是社会福利的促进。一般认为,经由政治上的集权与垂直控制和经济上的分权相结合,在经济增长导向的作用下,中国式分权创造出了使各地方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激励机制,促成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出现。但同时,这种强激励的代价也显而易见。与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不同,政府是多任务导向的,而基于经典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当代理人同时拥有多个要完成的任务时,对于其中某些易于观察的任务的强激励会使其将努力花费在这些易观察的任务上,而忽视那些不易观察的任务<sup>[11]</sup>,这是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偏向经济建设支出,而忽视科教文卫等社会性支出的逻辑基础。同时,各个地区的禀赋和增长潜力千差万别,却同时处于相同的经济增长目标驱动下,这种差异化的禀赋可能使不同地区呈现出差异化的财政支出模式<sup>[12][13]</sup>,以应对相同的增长目标。由于物质资本的增长绩效更明显且易于观察,落后地区可能更倾向于将资源配置向前者倾斜,而从社会性支出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这一长期增长的驱动力来看,这却会倾向于恶化落后地区长期的发展潜力,使得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更加困难,这是分权体制下区域之间财政支出模式地区差异的逻辑基础。因此,实际上分权体制本身在长期形成了一种增长和区域平等的两难<sup>[14]</sup>。

由于分权事实上度量了地方相对于中央处理区域事务的自由支配权,权力的范围越大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筹措资源的方式越多,从而对单一资源的依赖会降低。从这个视角来看,在分权度较低的阶段,由于地方政府可以支配的资源有限,在增长取向的驱动下,能快速见效的物质资本当然成为地方政府的首选,而这种分权的支出偏向效应非常明显,但是,当分权度逐渐提高,从而地方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不断上升时,其便有了更大的余地去追求一种更趋平衡的财政支出模式。

同时,就单个政府而言,随着时间的演进,这种偏向效应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从供给方面而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均财政收入水平的上升会一定程度上形成对财政预算的放松,这可能使政府有机会追求更趋平衡的支出模式;从需求方面而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客观上要求政府加大对于社会性支出的规模;同时,就科教文卫支出的经济性功能而言,健康和教育的被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两个重要方面,而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观点,当一国不断接近世界技术前沿时,将更加依赖人力资本作为增长的驱动<sup>[15][16][17][18]</sup>,因此,即使经济增长本身作为地方政府的目标不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分权的支出偏向也可能发生某种变化<sup>[19]</sup>。同时,考虑到中国式分权下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态势和区域之间的禀赋差异,在上述分权逻辑下这种动态变化将变得更加复杂。<sup>[13]</sup>

因此,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分权的支出偏向效应一方面会受到分权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可能随着时间和经济发展水平演进,因此应置于综合的框架下来考虑。

相当多的文献关注到了财政分权体制下的支出偏向效应,但是这种效应的动态变化却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而这可能是现有研究结论不尽一致的原因之一<sup>[20][21]</sup>。例如,部分研究指出,中国的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减少了对于基础教育的公共品供给<sup>[22]</sup>,甚至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义务教

育恶化的主要原因<sup>[23]</sup>；另一些研究却表明，财政分权促进了中国教育和健康水平的提高<sup>[24]</sup>；而变动指标或区域研究得出，收入角度的分权对于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有着积极的作用，而支出角度的分权则明显不利于我国教育的发展<sup>[25]</sup>；也有研究表明：经济发达地区分权程度增加对公共品投资有正向的激励，而经济落后地区分权程度增加很难激励有效的公共品投资<sup>[26]</sup>。

目前，关于财政分权问题的研究仍多集中于线性模型的设定，研究财政分权非线性影响的实证文献并不多，Hang 和 Cheng 通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财政分权变量的平方项，发现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之间显著负相关，而财政分权的平方项和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Qiao et al. 也考虑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使用了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模型，却得到了与 Hang 和 Cheng 刚好相反的结果。<sup>[14]</sup>虽然考虑到了分权影响非线性的可能性，以上研究仍然局限在线性方程设定的框架下，通过添加平方项等方法主观设定了参数非线性的形式；而关于分权与支出偏向之间的非线性研究还不多见。因此在非参数估计的框架下，将分权支出偏向效应的分析拓展至动态将会进一步丰富现有的研究。

基于以上思路，本文将在非参数估计的框架下分析分权的动态效应，一方面观察随着分权度自身的提高，其对政府支出的偏向有着怎样的动态影响，另一方面考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分权的支出偏向效应又会发生怎样的动态变化，特别是具有不同分权度的区域之间这种分权的支出偏向效应的动态变化会呈现怎样的差异。本文的安排如下：首先在第二部分介绍使用的方法和数据，第三部分报告和分析我们的回归结果，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 二、实证方法与数据说明

### （一）模型设计

我们通过构建非参数模型来分析财政分权对区域财政支出偏向的动态影响，非参数模型由于不必设定具体的模型形式而规避了模型误设的问题，同时还对可能出现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较为稳健。在我们的框架下分权对于支出偏向的影响同时受到分权度和人均财政收入的影响，首先我们在分权度和人均财政收入的平均值处估计分权的平均边际效应，以与现有的研究作比较，然后进一步通过逐点估计方法考察在分权度和时间演进两个维度下分权的动态影响。我们将面板数据的非参数模型设定为：

$$BLAS_{it} = a_i + f(FD_{it}, INC_{it}) + \varepsilon_{it}$$

其中， $BLAS_{it}$  是财政支出的偏向程度，以考察期内各省科教文卫支出占比和经济建设支出占比的比率来描述， $FD_{it}$  是考察期内各省财政分权度的度量， $INC_{it}$  是各省考察期内的人均财政收入， $a_i$  为个体效应。

我们采用 Henderson, Carroll 和 Li Qi<sup>[27]</sup> 所建议的 Bootstrap 方法就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进行选择。这一方法的原假设为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备择假设为固定效应模型。同时依照 Ullah 和 Roy<sup>[28]</sup> 的非参数局部线性方法对以上模型进行估计。

令  $y_{it} = BLAS_{it}$ ， $x_{it} = (FD_{it}, INC_{it})$ ，将函数  $f(\cdot, \cdot)$  在固定的点  $x = (x_1, x_2) = (FD, INC)$  处局部线性化，则可将模型变形为：

$$y_{it} = a_i + f(x) + (x_{it} - x)\delta(x) + \varepsilon_{it}$$

其中， $\delta(x) = (\beta(x), \gamma(x))'$ ， $\beta(x) = \frac{\partial f(x)}{\partial x_1}$ ， $\gamma(x) = \frac{\partial f(x)}{\partial x_2}$  分别表示财政分权和人均财政收入对于支



出偏向的边际影响。

通过最小化  $\sum_{i=1}^n \sum_{t=1}^T [(y_{it}-y_i) - (x_{it}-x_i)\delta(x)]^2 k(\frac{x_{it}-x}{h})$ , 可得  $\delta(x)$ :

$$\delta(x) = [\sum_{i=1}^n \sum_{t=1}^T (x_{it}-x_i)'(x_{it}-x_i)k(\frac{x_{it}-x}{h})]^{-1} \sum_{i=1}^n \sum_{t=1}^T (x_{it}-x_i)'(y_{it}-y_i)k(\frac{x_{it}-x}{h})$$

其中,  $y_i = \frac{1}{T} \sum_{t=1}^T y_{it}$ , 其他定义类似。 $k(\cdot)$  为核函数,  $h$  为窗宽。由  $\delta(x)$  的表达式可知:  $\beta(x) = (1, 0)$

$\delta(x)$ ,  $\gamma(x) = (0, 1)\delta(x)$ 。

因此, 与参数估计不同, 两个偏导数不再是固定的常数, 而同时是两个自变量的函数, 因此,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影响将不再是固定不变的, 而是随着自变量的取值不同而发生动态变化, 这是我们可以动态估计分权效应的基础, 基于分析目的, 本文重点考察分权的偏效应。

我们分别以两种方式来刻画分权对于支出偏向的边际影响。首先, 在  $\bar{x} = (\bar{x}_1, \bar{x}_2)$  处求得  $\delta(\bar{x})$ , 即平均水平的边际影响; 其次, 固定人均财政收入, 令其取均值, 然后观察边际效应随着财政分权度的变化如何呈现出动态变化的情况, 即求得  $\delta(x_1, \bar{x}_2)^{[29]}$ , 以得到我们关注的分权的动态效应, 然后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分别求得分权度动态变化对支出偏向的影响, 以考察随着时间演进和人均财政收入上升分权效应的变化。

## (二) 数据说明

### 1. 财政分权度

现有文献中关于财政分权度的度量存在各种不同方法, 不同的计算方法服务于不同的研究目的, 但总体而言, 需要着重考虑中央的转移支付和各省的规模因素<sup>[30]</sup>, 忽视前者会导致高估西部等经济较为落后省份的分权度, 忽视后者则可能高估人口较多省份的财政分权度, 为此, 我们采用人均本级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本级财政支出这一比例来度量, 从而同时剔除了人口规模和中央转移支付的影响。事实上, 在目前的分权体制下, 地方政府并没有独立的税收自主权, 因而支出分权是衡量目前中国财政分权度的更好指标。

### 2. 财政支出结构

区域的财政支出结构, 即物质资本投资占比和人力资本投资占比分别以各省级政府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和科教文卫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来衡量。其中经济建设支出包括: 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掘改造支出、地质勘探支出、科技三项支出、农林水利支出、工业交通支出和城市维护费; 科教文卫支出则主要包括了文教事业费、科学事业费和卫生经费。个别年份的支出项目有所变动, 在计算时进行了加总和调整。

人均财政收入以 1990 年为基期进行了平减, 其中人口数以各省年末总人口数为准。由于 1997 年重庆成为直辖市从四川省划分出来, 所以 1997 年及以后各年的数据将四川和重庆加总作为大四川处理。全部数据均来自《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1992—2007 各年。

##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模型的选择

我们使用 Henderson, Carroll 和 Li Qi<sup>[27]</sup> 所建议的 Bootstrap 方法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 所得 J 值为 24.1223, 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 (二) 分权的平均支出偏向效应

由于在我们的非参数分析框架中, 分权对于支出偏向的边际影响同时是财政分权度和人均财政收入两个变量的函数, 因此, 我们首先在财政分权度和人均财政收入的均值处取值, 估算出分权对于支出偏向的边际影响在这两个变量的平均值处的大小, 以与目前文献中的参数估计结果进行比较。

表 1 分权和人均财政收入的平均支出偏向效应

被解释变量	a 值	h 值	财政分权度		人均财政收入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支出偏向	0.9	0.4160	-0.1259***	-4.1116	0.1031***	2.7396
	1.2	0.5547	-0.1374***	-5.8502	0.1153***	3.6914

注: \*\*\* 表示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变量平均值处的分权边际效应估计结果表明, 随着财政分权度的提高, 分权的支出偏向效应会不断呈现恶化的趋势, 这一结论与目前

大多数文献的结论是一致的, 即分权所形成的标尺竞争造成了财政支出偏向经济建设而忽视科教文卫等社会性支出。同时, 随着人均财政收入的上升, 分权的支出偏向效应倾向于较为显著地得到弱化, 这一点则未在目前的文献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一方面, 这可能来自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社会性支出占比提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则可能来自经济增长步入一定阶段之后区域经济增长对于高人力资本的需要。但是, 以上结论仅仅是从参数平均取值处对分权的支出偏向效应做出了分析, 考虑到分权度的变化以及各个地区分权水平的差异, 我们有必要引入分权影响的动态效应的分析。

## (三) 分权的动态支出偏向效应

下面我们进一步描述随着分权度的变化, 这种偏向物质资本投资而忽视人力资本投资的支出偏向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为了同时体现随着时间演进和人均财政收入上升对分权动态效应的影响, 我们分别求得 1994、1998、2002 和 2006 年全国各省份人均财政收入的均值, 在这些均值处求得各个分权度上财政分权的支出偏向效应, 以观察分权的动态效应会随着时间演进和人均财政收入的变化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将所得结果列表如下<sup>①</sup>:

我们基于以上数据绘出支出偏向随着分权度和时间演变的趋势图如下:

首先, 综合考察样本期内所选取的 4 年分权对支出偏向的动态影响会发现, 尽管随着时间演进, 人均财政收入不断增加, 分权的动态效应却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这种随着分权程度不同而发生的对于支出偏向的动态影响可以大致用一个分权度较低阶段的“W”形状和一个分权度较高阶段的“M”形状加以描述。尽管总体而言分权促成了支出偏向, 但是随着分权度的逐渐变化, 这种偏向效应也在发生变化。在分权度较低的阶段, 分权对于支出偏向的作用较大, 但是当分权度到达 5 左右的时候, 似乎发生了一次跳跃, 原有的偏向效应大大减弱, 甚至趋于消失, 虽然这种趋势并不很明显。同时, 可以发现, 在分权度比较低的阶段, 分权的支出偏向效应波动比较大, 而当分权程度到达一定阶段之后, 这种波动逐渐变小, 甚至最终保持在一个相当稳定的水平上。

如何对这种动态变化做出解释呢? 支出分权事实上度量了地方相对于中央的事权, 尽管这种事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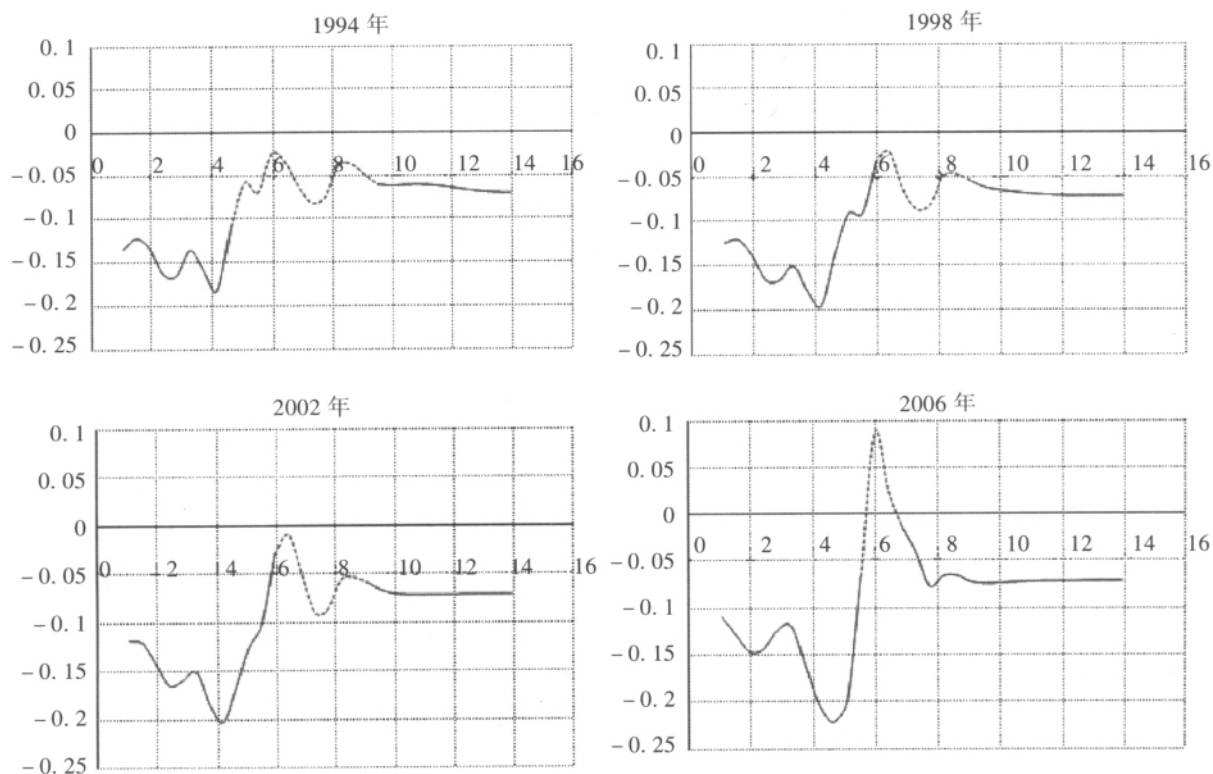
<sup>①</sup>我们将分权度等分为 30 个点, 在每一个点上估计出了分权度的支出偏向效应, 由于篇幅所限, 这里只展示了其中隔点选取的 15 个数据点, 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

表 2 财政分权度的动态支出偏向效应

分权度值	1994 年		1998 年		2002 年		2006 年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1.0698	-0.1354	-3.8509	-0.1246	-3.7394	-0.1180	-3.4583	-0.1097	-2.5828
1.9571	-0.1343	-5.5497	-0.1395	-5.9981	-0.1417	-6.1509	-0.1468	-5.2879
2.8445	-0.1653	-4.9080	-0.1667	-5.6695	-0.1594	-5.8564	-0.1242	-4.5796
3.7319	-0.1589	-3.2714	-0.1798	-3.9383	-0.1840	-4.1313	-0.1615	-3.6471
4.6192	-0.1083	-1.4929	-0.1375	-2.3092	-0.1660	-3.2304	-0.2219	-2.9957
5.5066	-0.0693	-0.6094	-0.0924	-1.3333	-0.1013	-1.8072	-0.0671	-1.1351
6.3939	-0.0333	-0.3430	-0.0216	-0.2922	-0.0095	-0.1465	0.0238	0.3185
7.2813	-0.0813	-0.6261	-0.0877	-0.5635	-0.0901	-0.5506	-0.0411	-1.5091
8.1686	-0.0372	-0.6501	-0.0498	-1.0483	-0.0571	-1.2109	-0.0666	-1.2828
9.0560	-0.0495	-1.2976	-0.0552	-1.5455	-0.0592	-1.8026	-0.0729	-4.0110
9.9434	-0.0621	-1.8076	-0.0653	-2.5560	-0.0709	-4.1339	-0.0743	-3.9250
10.8307	-0.0607	-1.1095	-0.0690	-2.8819	-0.0722	-3.6533	-0.0728	-3.6574
11.7181	-0.0632	-1.3734	-0.0710	-3.2291	-0.0720	-3.4179	-0.0721	-3.4154
12.6054	-0.0678	-2.3061	-0.0716	-3.2894	-0.0719	-3.3307	-0.0719	-3.3281
13.4928	-0.0706	-3.0273	-0.0718	-3.2919	-0.0718	-3.3014	-0.0718	-3.3002

的扩大在很多方面都意味着财政支出负担的加重,但同时,事权的范围越大也同时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筹措

资源的方式越多,从而对单一资源的依赖便会降低。从这个视角来看,在分权度较低的阶段,由于地方政府可以支配的资源有限,在增长取向和分权竞争的驱动下,能快速见效的物质资本当然成为地方政府

图 1 财政分权的动态支出偏向效应<sup>①</sup>

①实线部分表示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虚线部分则表示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仍不显著。



的首选,从而这种分权的支出偏向效应非常明显,但是,当分权度逐渐提高,从而地方政府筹措资源的能力不断上升时,其有了更大的余地去追求一种更加平衡的财政支出模式。虽然物质资本的增长促进作用很快,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单纯依靠物质资本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模式,最终会带来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而这种递减效应的抵消则需要适当扩大其他要素的投入和提高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及技术水平,所以倾向于追求一种更平衡的财政支出模式是资源约束得到放松之后的可能选择。

其次,我们比较样本期内4年随着时间演进和人均财政收入的变化,分权的动态效应又如何变化。我们发现,随着人均财政收入的提高,分权的动态效应基本保持稳定状态,但是仍然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在分权度较高阶段的“M”形状似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变得逐渐不再明显,特别是其尾端变得逐渐平坦,这意味着,随着人均财政收入的上升,更高的分权度会促使支出偏向到达一种更稳定的状态。如果说事权上的分权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方政府筹措资源的能力,人均财政收入水平的上升则直接代表了地方政府可以控制的资源,因此,基于上文的逻辑,我们仍然可以推断,随着人均财政收入水平的上升,地方政府筹措资源的综合能力上升,从而更有可能保持一种较为稳健的支出模式。其次,还可以发现,随着时间演进和人均财政收入水平的提高,分权度较高部分的支出偏向倾向于减弱,极端值从1994年的-0.0605到2006年的-0.0411,而同时,分权度较低部分的支出偏向效应却在持续加强,极端值从-0.1826、-0.1958、-0.2022到-0.2219<sup>①</sup>。周黎安<sup>[31]</sup>分析指出,整个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相对于中央的支出分权是基本保持稳定的,而我们的进一步考察则表明,样本期内4年全国各个地区的分权相对排序也基本保持稳定<sup>②</sup>,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演进和人均财政收入的上升,那些分权度较高地区的支出偏向在倾向于缓和的同时,分权度较低地区的支出偏向却恶化了。

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得出,在样本期内4年,全国各地区真实人均财政收入不仅绝对差距呈扩大趋势,且相对来看,分布的标准差也分别从0.6136、1.0355、1.4208达到了1.9114,地区间呈现不断分化的态势,可见以下的分布散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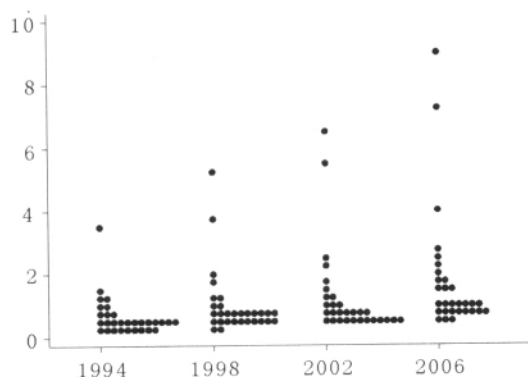


图2 真实人均财政收入的分布变化

进一步考察分权度与人均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呈高度相关关系,相关系数4年间分别为0.7913、0.8894、0.7238和0.8185,即那些分权度较高的地区更倾向于拥有较高的人均财政收入,这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增长压力和分权竞争的驱动下,财政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促使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运用分权带来的支配区域资源的权力,进一步对资源进行扭曲性的配置,由于物质资本投资对于增长的见效更快,地方政府便有动力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向物质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sup>③</sup>。但是,如果从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区域长期发展潜力基础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区域之间发展潜力的差距还在逐渐扩大,阶段不同报酬不同。

①在5%的水平上做出的结论,在其他显著性水平上的分析未发生变化的总体趋势。

②通过分权度分布的散点图可以发现这一点,由于篇幅所限未能展示,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

③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落后地区由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而比发达地区拥有更高的资本边际收益。

#### 四、结 论

本文使用非参数方法实证分析了分权对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影响的动态变化。我们的研究发现,平均而言,财政分权促进了地方政府重视经济建设支出而忽视科教文卫支出的偏向;而通过将这一支出偏向效应拓展至动态表明,在财政分权度从低到高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跳跃点,在此点以下的阶段,分权显著地促进了支出的偏向,并且其对支出偏向的影响波动较大,而当分权度达到此点以上时,分权的支出偏向效应则大大减弱,并且其影响的波动逐渐趋于缓和。进一步地,通过分析随着时间演进和人均财政收入上升分权对支出偏向影响的变化发现,高分权度地区的支出偏向趋于缓和,而低分权度地区的支出偏向却逐渐恶化。我们基于财政收入差距和分权体制下地区竞争的逻辑对以上变化做出了解释。从增长模式转变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区域之间长期增长潜力的差距在趋于扩大。

目前,随着我国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而鉴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强势作用,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成为了这种增长模式转变的核心。分权体制所形成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区竞争造就了中国的增长奇迹,而目前看来,这种体制下所形成的支出偏向则成为了扭转经济增长模式的困难之一,同时,结合区域之间差距的不断扩大,这种地区竞争还可能不断拉大地区之间的增长潜力差距,从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将变得更加困难,因此,目前的这种分权模式必须改变。令人欣慰的是,随着国际范围内节能减排呼声的高涨,目前各级政府都在中央的计划安排下将能耗降低作为执政任务之一,这种调整从另一个侧面已经初步表现出了增长模式转变在政府治理层面的影响。

#### 参考文献:

- [1] QIAN YINGYI and G. RONALD.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0002 - 8282), 1998, 88(5): 1143 - 1162.
- [2] QIAN YINGYI, G. RONALD and C. XU.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S0895 - 3309), 1997, 11(4): 83 - 92.
- [3] JIN, H., QIAN, Y. and WENGAST. B. R.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and Chinese Style[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S0047 - 2727), 2005, 89(9 - 10): 1719 - 1742.
- [4] 王永钦等. 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论分权式改革的得失[J]. 经济研究, 2007, (1): 1 - 12.
- [5] 张 军. 为增长而竞争[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6] 张 军, 王世磊. 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 [J]. 经济研究, 2007, (3): 32 - 43.
- [7] 李文星等.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J]. 浙江社会科学, 2009, (11): 117 - 125.
- [8] 傅 勇, 张 晏.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 管理世界, 2007, (3): 4 - 13.
- [9] DAVUDI, H. and ZOU, H.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Cross - Country Study[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S0094 - 1190), 1997, 43(2): 244 - 257.
- [10] QIAN YINGYI and 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S0895 - 3309), 1997, 11(4): 83 - 92.
- [11] B. HOLMSTROM, P. MILGROM. Multitask principal - agent Analysis: Incentive Contract, Asset Ownership, and Job Design[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S8756 - 6222), 1991, 7(special issue): 24 - 52.
- [12] CAI HONGBIN, DANIEL TREISMAN. Does Competition for Capital Discipline Government? Decentr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Public Polic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0002 - 8282), 2005, 95(3): 817 - 830.



- [13] MARTINEZ – VAZQUEZ, JORGE and MCNAB, ROBERT M.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Macro – Stability, and Growth[J]. Hacienda Pública Española Revista de Economía Pública, 2006, 174(2): 25 – 49.
- [14] BAOYUN QIAO, JORGE MARTINEZ – VAZQUEZ, YONGSHENG XU. The Tradeoff Between Growth and Equity In Decentralization Policy: China’s Experienc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S0304 – 3878), 2008, 26(1): 112 – 128.
- [15] JEROME ANDENBUSSCHE, PHILIPPE AGHION, and COSTAS MEGHIER. Growth, Distance to Frontier and Composition of Human Capital[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S1381 – 4338), 2006, 11(2): 97 – 127.
- [16] BRUNO AMABLE, LILAS DEMMOU, IVAN LEDEZMA. Competition, Innovation and Distance to Frontier[R]. CES Working papers. 2008.
- [17] PHILIPPE AGHION, ALBERTO ALESINA, FRANCESCO TREBBI. Democracy, Technology, and Growth[R]. Working paper, 2007.
- [18] LAURENS CHERCHY AND WIM MOESEN.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Levels versus Catching up and Frontier Shifts[R]. Working paper, 2004.
- [19] 王 珺. 增长取向的适应性调整: 对地方政府行为演变的一种理论解释[J]. 管理世界, 2004, (8): 34 – 47.
- [20] 乔宝云等.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 (6): 37 – 47.
- [21] 龚 锋, 卢洪友. 公共支出结构、偏好匹配与财政分权[J]. 管理世界, 2009, (1): 10 – 21.
- [22] 罗伟卿. 财政分权及纵向财政不平衡对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的影响[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1): 13 – 20.
- [23] 卢洪友, 李 凌. 财政分权视角下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落后的原因分析[J]. 财贸经济, 2006, (12): 57 – 61.
- [24] 黄君洁. 地区差距、财政支出分权与人类发展——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9, (10): 35 – 44.
- [25] 周业安, 王 曦.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教育发展[J]. 财政研究, 2008, (11): 55 – 62.
- [26] 丁菊红, 邓可斌. 转型中的分权与公共品供给: 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J]. 财经研究, 2009, (3): 32 – 50.
- [27] DANIEL J. HENDERSON, RAYMOND J. CARROLL, QI LI.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and Testing of Fixed Effects Panel Data Model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S0304 – 4076), 2008, 144(1): 257 – 275.
- [28] QI LI, JEFFREY SCOTT RACINE. Nonparametric Econometric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29] 周先波, 盛华梅. 信息化产出弹性的非参数估计[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8, (10): 130 – 141.
- [30] 何庆光.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地方税收收入[J]. 统计研究, 2009, (3): 59 – 63.
- [31] 周黎安. 转型中的地方政府[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收稿日期: 2010—05—04 责任编辑: 肖 磊)